

雅理译丛 — 田雷 主编

〔美〕约翰·梅里曼 著
John Merriman

刘怀昭 译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大屠杀

巴黎公社生与死

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 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

MASSACRE

雅理
译丛

田雷
主编

MASSACRE

大屠杀

巴黎公社生与死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美〕约翰·梅里曼 著 刘怀昭 译

John Merriman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by John Merriman
Copyright © 2014 by John Merri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 Fletcher & Compan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版权登记号：图字01 - 2016 - 43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美)约翰·梅里曼著；刘怀昭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620-6931-7

I. ①大… II. ①约… ②刘… III. ①巴黎公社—历史—法国 IV. ①K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7689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9.00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大屠杀》摄人心魄，读来令人动容。约翰·梅里曼娓娓道来而又不露声色，对细节把握自如——包括很多在此之前从未公之于众的新故事——为这一代推出了有关公社的最佳大众历史读物。

斯蒂文·英格朗 (Steven Englund)

《拿破仑：政治的一生》一书作者

解放之梦，镇压之魔——巴黎公社是 19 世纪欧洲政治想像的一个焦点。希望与恐惧，激情与仇恨，社会与政治斗争，约翰·梅里曼的新著再现了一个著名的革命政权并导致它走向惨烈的毁灭的这一切。

乔纳森·斯伯尔伯 (Jonathan Sperber)

《卡尔·马克思：十九世纪的一生》一书作者

故事描述了炽热而闪光的思想、令人瞠目的暴力以及非凡的人民。在《大屠杀》一书中，约翰·梅里曼将他对法国精深的了解与他擅长的叙事结合起来，为我们勾勒出那改变了巴黎并预示了我们当今时代巨变的 64 天。从开罗到基辅，读着每天的热点标题，顿感这本书的出现再及时不过，也写得再好不过。

玛雅·嘉参奥夫 (Maya Jasanoff)

《解放的流亡：美国效忠派在革命世界》的作者

严谨、生动，该书再现了理想主义、恐怖，更再现了巴黎公社的人民。《大屠杀》填补了一项空白，并将引起人们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的关注。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lizabeth Kostova)

《天鹅贼》及《历史学家》的作者

约翰·梅里曼以其一贯的活力、简洁的文字和渊博的法国历史知识阐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重要的是，这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梅里曼对普通巴黎民众的同情贯穿了他的叙事，他以一种打动人心的风格呈现了 1871 年那场降临在人们身上的悲剧。

大卫·A. 贝尔 (David A. Bell)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不忍释卷。一位大师级历史学家笔下的一场为现代欧洲定型的内战，捕捉住了其间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残酷性，英雄主义与血腥。

彼得·麦克菲 (Peter McPhee)

《罗伯斯庇尔：革命的一生》一书的作者

雅理译丛

编委会

(按汉语拼音排序)

丁晓东 甘阳 胡晓进

黄宗智 强世功 刘东

刘晗 刘海光 乔仕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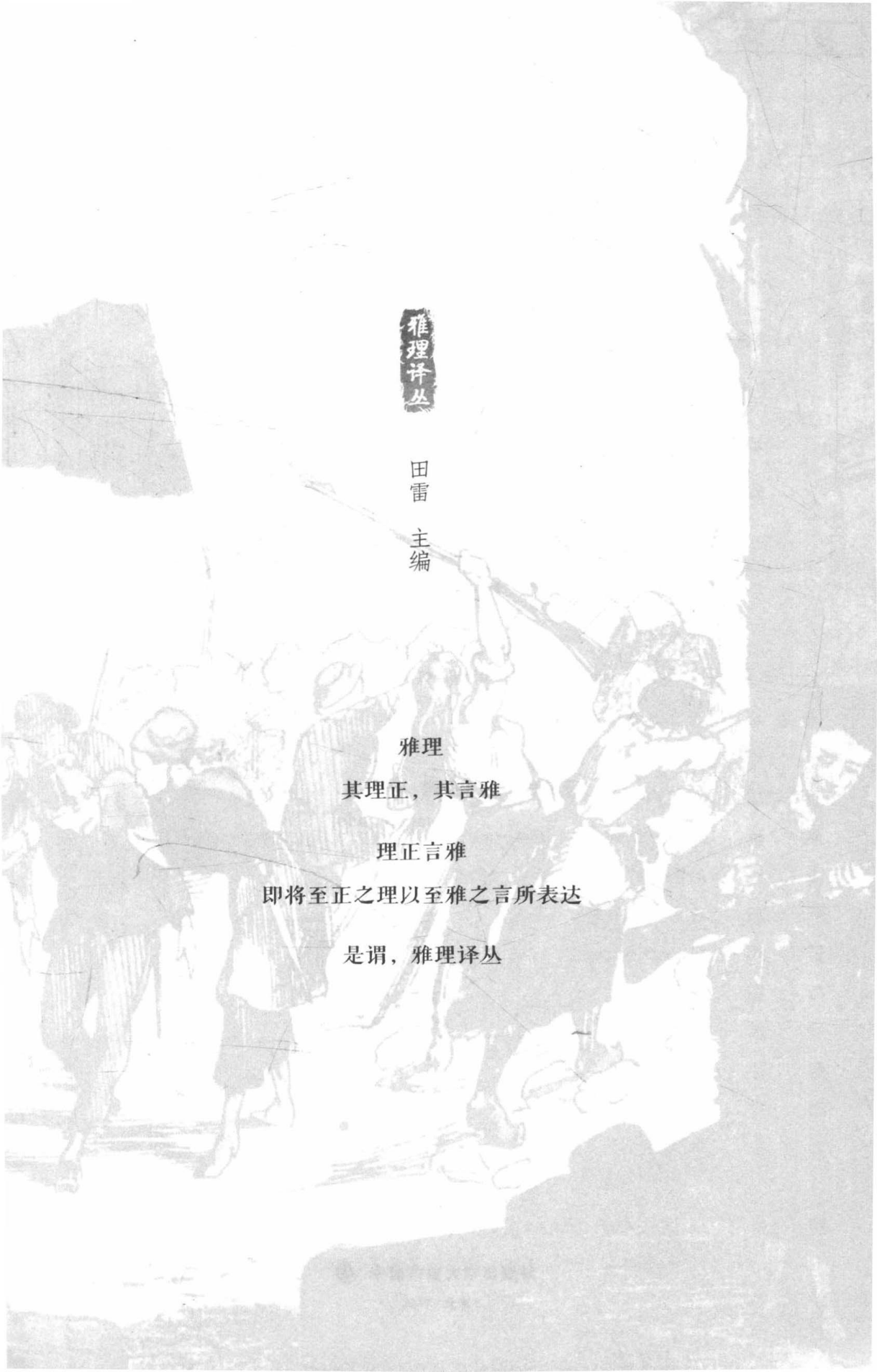
宋华琳 田雷 王希

王志强 阎天 于明

张泰苏 章永乐 赵晓力

郑戈 左亦鲁





雅理译丛

田雷

主编

雅理

其理正，其言雅

理正言雅

即将至正之理以至雅之言所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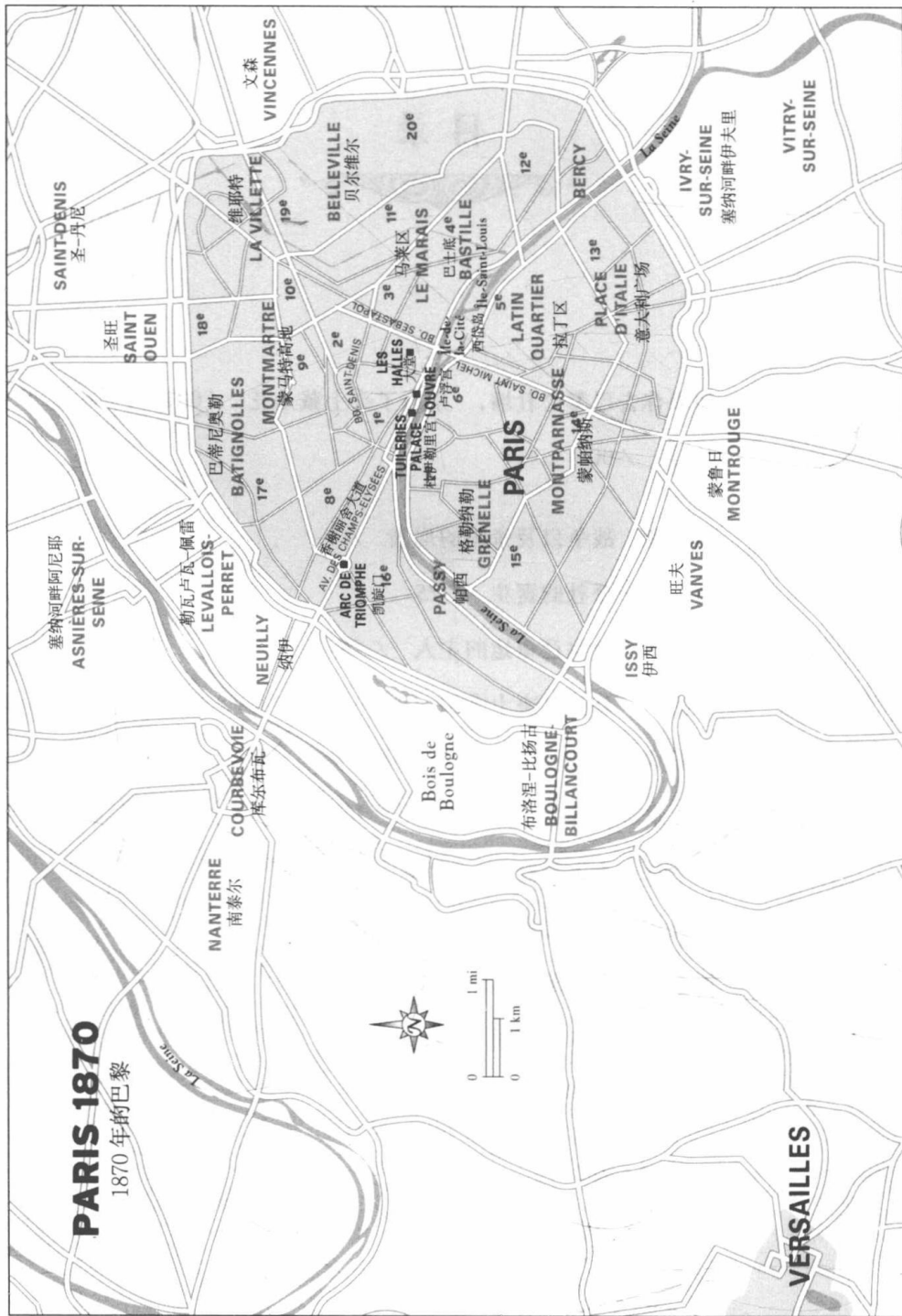
是谓，雅理译丛

致 唐 · 拉姆

For Don Lamm

PARIS 1870

1870 年的巴黎



如果你去巴黎公社墙，别忘了头上戴朵花

(代译序)

刘怀昭

在巴黎短暂的逗留中能挤出时间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人，必定是个骨灰级的文青吧。至少在那样一个临近圣诞的日子里，墓地里看不到太多的活人和很多的鲜花，而树叶也全部掉光了。所以，当我告别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在斑驳的树影下逡巡中，被乌鸦的叫声惊醒，然后毫无预期地与巴黎公社墙迎面相遇时，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撞墙”的感觉。

面对着它我一时无措，不知作何感想。它一直只存在于那已经淡忘的中学课本中，是一段概念化的历史，是我们并没有来得及真正了解但已经匆匆告别的革命。而且即便我已经站在了它的面前，它也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它只是一段爬着枯藤的矮墙，和一块记录着时间的大理石纪念铭牌，上面没有名字——无名纪念碑，不能确定它本意要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精神，还是资产阶级对那些声称是他们的掘墓人的死者的不屑。

这便是我——或许还包括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无论是文青还是



愤青、到过巴黎还是没有到过巴黎——在有机会读到约翰·梅里曼的这本《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之前，对巴黎公社的认知状态吧。

比如，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概念：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曾阐述和肯定了公社的原则。

但谁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到底什么是公社的原则？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应该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巴黎人，是画家库尔贝，是工人瓦尔兰、铜匠泰斯，是用双胞胎儿子的名字做笔名的女作家贝拉，是洗衣妇之子埃米尔·杜瓦尔，既是新教牧师埃利·雷克鲁，也是他那无政府主义的亲兄弟、地理学家伊莱沙。巴黎的工人阶层也好，共和派及社会主义知识份子也好，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份“自由商讨的契约”（巴黎公社文告）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想要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又比如，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暴力，我们接受过灌输，也经历过对灌输的颠覆和“告别革命”的思潮。但暴力究竟是谁的原罪？书中我们看到，在巴黎公社被血洗之前，包括共济会在内的三家团体曾对凡尔赛政府施压，希望政府能承认巴黎人的自治权利、认可巴黎公社向“民主和社会共和”迈出的第一步，从而达致谈判解决争端。“事实上，公社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忽略他们的语言暴力水平——是非常用心地显示他们不会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军那样做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巴黎公社整体上保持了对法律的依附（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而是申请了银行贷款，尽管强制没收易如反掌）。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是多么对

立，他们竟都不约而同地用暴力革命来定义巴黎公社。但本书作者以他占有的史料指出，历史终将向公社整体上的人性化致敬。

——因为，点燃巴黎公社革命之火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在普法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市民自救和反抗腐败帝制的城邦自治，以及多元共和思想的合流。从巴黎的舞厅到城市边缘的仓库，让巴黎人享有政治权利并成为自由的灯塔，这样的思想一度深入人心。这些权利既包括义务的世俗教育，也包括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争取妇女权利为己任、坚持绝不能“将女性的地位与人道”分开的巴黎公社妇女运动先驱——或许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领袖——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失败后受审时，谴责了公社混乱中出现的处决人质的行径，强调公社“绝对与任何暗杀或纵火行为无关”，社会革命才是它的目标。“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种对公平、正义与善的向往，不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题？

——因为，巴黎公社曾开启了一系列基于公正与平等思想的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推行普选、对妇女联盟的认可等。然而一个承载着主权在民的认知与期许的自治城邦，仅仅存在了64天，就在13万政府军“血腥一周”的大屠杀中走向了尽头。作者的结论是：真正血腥的是国家暴力，它是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法军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的这场大屠杀，令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笼罩在不散的阴魂之中。你可能被杀，因为你是某人，因为你想得到自由——这可能就是1871年5月21-28日那个血腥之周、欧洲19世纪最大的一场屠杀的终极意味。”

本书作者、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因此本书的主要脉络是凡尔赛政

府军针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他指出，“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19世纪最后一场革命，那么国家随后进行的血腥的、系统化的镇压就无异于释放出了20世纪的恶魔。可悲的是，这或许是巴黎公社留下的一笔更大的遗产，比普通大众在此期间获得的自由更大。”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何巴黎公社之后，别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因此而笃信暴力手段，并在暴力革命成功后，仍摆逃不掉血腥轮回的怪圈？

掩卷之时，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那块无名纪念牌也不再面目模糊——上面没有公社死难者的名字，甚至没有死于这面墙前负隅顽抗的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的名字，答案或许与理论无关，而只是技术性的：“当报纸要求发布军事法庭处死名单时，他们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临时法院不保留记录。很多人干脆消失了，成了无名的受害者。当有些遇难公社社员的尸体被认出来时，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当局一直拒绝让家属来扫墓、放置鲜花或其它任何东西。”

我不曾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造访过巴黎公社社员墙，但不难想象1908年立起大理石纪念牌匾之后，法国历经的社会和解的努力，和纪念墙前那些纪念的鲜花。实际上，在纪念牌匾出现之前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才开始真正成形，法国工会得以合法化并成长壮大。公社的历史不仅被视为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本书中揭示的，“已成为法国国家历史的一个重大、积极的事件。”

更复杂的感受，在掩卷时欲说还休，联想到的是曾对巴黎公社提出批评和质疑的雨果，在公社被血腥镇压后转而谴责政府，并因激怒了梯也尔而被法国政府施压驱逐出比利时。此后经年，雨果一

如果你去巴黎公社墙，别忘了头上戴朵花

直在为公社幸存者的营救和特赦而奔走，甚至还写有一首诗，名叫《更伟大的英雄》，献给狱中的路易丝·米歇尔。但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说，雨果转而支持革命的暴力，就像他反映法国革命的巨著《悲惨世界》，与其说是用人性的话语来诠释革命，不如说是在诠释人性本身，并以此唤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对理想的追求：“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Our life dreams the Utopia. Our death achieves the Ideal.）

前言

ix

1871年3月18日，住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的巴黎人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法国军队正抢夺国民自卫军的大炮。下令出兵的是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首脑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而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凡尔赛是旧制度时期波旁贵族的老巢。梯也尔被巴黎人那一触即发的激愤情绪吓着了，因此想一举解除巴黎及其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卫军各级人员主要由工人组成，他们渴望建设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对1870年7月爆发的那场导致第二帝国失败的普法战争耿耿于怀，并对临时政府在此战争中的投降行为愤懑不已。

法军遭到蒙马特、贝尔维尔（Belleville）及肖蒙山丘（Buttes - Chaumont）的男男女女们的顽强抵抗，故没能抢走他们手上的大炮。当四千法军大兵压境之际，趁着军队停下来等待运载武器下山的马匹时，蒙马特的妇女拉响了警报。住在高地上的劳工阶层居高临下，俯瞰首都，防止全副武装的部队用马匹将大炮运走，并开始构筑街垒、路障，完全是传统的革命斗争作派。士兵们开始跟蒙马特的居民亲近起来。派遣到贝尔维尔、维耶特（La Villette）和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的六千大兵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儿去。最终，巴黎人保住了大炮。

受挫之后，梯也尔把军队从巴黎撤回到凡尔赛，打算重组之后再度出兵收复失地。成千上万来自巴黎的富人加入到他的阵营。与此同时，在巴黎，左翼激进分子宣告成立名为“公社”的开明自治政府，旨在让那些第一次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巴黎人得到自由。来自平民区的劳动阶层家庭大摇大摆地到首都的时尚街区漫步，憧憬着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并准备行动起来去实现它。他们这一进步主义的公社仅仅维持了10个星期，就在5月最后一周的血洗中灰飞烟灭了。

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毁灭是19世纪最惨痛、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时至今日仍影响深远。在巴黎的街头，梯也尔的军队枪杀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孩子。士兵们处死了许多参与捍卫公社的人。另外，还有很多人因为一身工人打扮，或残留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制服，甚至仅仅因为言谈举止的特征而引来杀身之祸。法军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的这场大屠杀，令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都笼罩在不散的阴魂之中。你可能被杀，因为你是某人，因为你想得到自由——这可能就是1871年5月21-28日那个血腥之周、欧洲19世纪最大的一场屠杀的终极意味。

在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 - 1870）期间，巴黎曾是一座激荡着社会矛盾与对立的城市。一方面，首都巴黎带领着法国经济飞速增长。工业继续由小作坊的手工业者主导，他们造就着巴黎的品牌。高档手套及其它奢侈品，是法国制造业的象征。皇家金融机构推动着巴黎及其周边的工业制造，给有钱人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他们出入奢华的皇家社交场合，看大戏、坐着马车在城里及布洛涅林苑里横冲直撞，而平民则要步行去上班。动力强大的火车喷着蒸汽，将阔绰的乘客从蓬勃兴起中的首都带往多维尔（Deauville）

及诺曼海岸其它日渐优雅的城镇。

经济的发展给巴黎带来一派繁荣景象，因而转移了人们对城中普遍的贫富分化问题的重视。拿破仑三世和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Haussmann）让窄巷纵横的中世纪的巴黎铺上了通衢大道。形形色色的餐馆、酒吧迎接着手头宽裕的人们。在破败且人口拥挤的巴黎东区和北区，打工仔住在低矮狭小的出租房里艰难图存。对他们来说，苦日子似乎从来就没有尽头。

到了19世纪60年代，拿破仑三世所面临的政治反对力量已经壮大起来，以至于很多巴黎人都预感到他的统治将以灾难告终。法国的阶级斗争历史悠久，在此之前的60年间，已经爆发过3次将皇帝拉下马的革命。但没有一次像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大不列颠那样成功，也从没有给法国带来过安稳的日子。

xi 但拿破仑三世却自信地认为，自己比前辈们强，命中注定会坐稳江山。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出生于1808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在瑞士的一座城堡中长大，从小置身于他叔叔统治下的种种幻象中，坚信自己未来能够光宗耀祖。他视家族与法国的命运为一体，野心勃勃之余，兼具几分政治投机主义的敏锐感，但其判断力之差可谓人尽皆知。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of the Orléans，是法国波旁皇室的幼支）为国王的七月王朝，继续对拿破仑·波拿巴家族采取强迫放逐的政策。路易-拿破仑曾在1836年率领一拨追随者企图进犯法国，但在行进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处要塞时被捕。四年后他卷土重来，在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的海岸登陆后再度重演上一次的遭遇。1840年，他在法国北部被囚。1846年，他乔装成工人逃脱出来。这些惨败的经历令这位拿破仑一世之侄享有某种小丑般滑稽的名声，

其身边尽是些酸腐而又无能的亲信。他身材矮小，越长越胖，很像他叔叔——他的敌人也常拿叔侄二人进行比较，称他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并取笑他的“死鱼眼”。但尽管早年处处碰壁，路易-拿破仑却出人意料地是个乐天派，他相信自己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会惠及所有巴黎人，无论贫富。在狱中，他以不寻常的谦逊口吻写道：“我相信，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相信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1〕

1848年的二月革命是当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之一，它结束了奥尔良王朝，路易-拿破仑旋即重返巴黎，并于1848年12月，即路易-菲利普国王被推翻9个月之后，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在对左翼进行了一番打压之后，这位“王子总统”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其原因是，他的总统任期将于次年结束。巴黎人一觉醒来便进入了戒严状态，发现由各省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中的民主-社会党人都被抓了起来。

但有些巴黎人不甘心向又一个帝国束手称臣。在巴黎中部和东部的劳工居住区，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引发了以失败告终的骚乱。超过125 000人（当中多数是农民）拿起了武器，为保卫共和国而战，特别是在南部，有些秘密社团在那里设有地下支援网络。但这些起事者根本不是正规军的对手，很快就自命不保，作鸟兽散。作为1871年巴黎公社劫难的一个先兆，大约27 000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即由高级军官、法官及行政官员组成的所谓“共同委员会”），而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叛乱。成千上万的人被定罪，有些被流放到

xii

〔1〕 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1945*, Vol. 1 (Oxford, 1973), p. 511; Roger Price, "Napoleon III", See John Merriman and Jay Winter, eds., *Europe 1789 to 1914*, Vol. 3 (Detroit, 2006), p. 1590.